

戈巴契夫的亞太政策

龍舒甲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約聘助理研究員)

前言

戈巴契夫擔任蘇聯領導人後，其內外政策呈現出經濟與政治改革重於核武發展與軍事擴張的型態。在對外政策上，他希望藉著降低國際間的政治緊張與軍事衝突，使蘇聯停滯的經濟能在民主化與公開性的環境下，進行深入而廣泛的改造；並使它在西元二千年時能夠振興起來，在國際政經社會中提升影響力。在此理想下，他以較為理性而圓熟的姿態，先緩和與美國及西歐的緊張關係，然後即轉入亞太地區，希望透過和亞太各國的平等互利與廣泛的經貿合作，達成與亞太社會關係的正常化，從而在改善並確保亞太地區安全的號召下，建立並擴張蘇聯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

蘇聯「亞太政策」的背景

當蘇聯在一九三四年應邀加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時，蘇聯代表李維諾夫(Maxim Litvinov)在入會演講上曾提到「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的概念。①蘇共在一九五六年春召開第廿屆代表大會時，赫魯雪夫在報告中談到「亞洲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 in Asia)，他說：「歐洲集體安全與亞洲集體安全的保證以及裁減軍備這三大問題的解決，可以奠定長久和平的基礎。」②兩年後，正值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召開會議時，蘇聯官方的喉舌「塔斯社」又宣稱，在歐洲及亞洲建立集體安全體系以取代軍事集團，是在各國之間建立信賴不可或缺的條件。③一九六九年六月在「

註① 魏守嶽著，「蘇聯建議『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研究」，東亞季刊，第六卷第一期，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頁三一—五〇。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畢英賢著，「論蘇俄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問題與研究，第十二卷第一期，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月，頁三九—四二。

共產黨與工人黨國際會議」上，布里茲涅夫強調：「事態的進程已把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任務提到日程表上來了。」^④依當時的國際情勢看，蘇聯領袖顯然欲藉「集體安全體系」來圍堵或孤立中共及排除美國在亞洲的勢力。一九七二年春，布氏在蘇聯工聯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再度具體地提出「亞洲集體安全」的構想，同時也出現了「區域經濟合作」的口號。^⑤然而中共首先反對，並認為這是布里茲涅夫的威脅與陰謀。蘇聯自稱是個亞洲國家，但在當時，美國在亞洲地區對蘇聯圍堵，使蘇聯感到美國的軍事、政治與經濟威脅，故提出「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建議與之抗衡。^⑥但是，由於亞太有些國家反應冷淡，而沒有任何進展。

一九八六年四月，蘇聯對其亞太政策發表了一份「蘇聯政府聲明」。一方面表示，蘇聯希望在本世紀末人類能完全消除核武器，對亞太各國的利益作全面考慮；另一方面認為，建立互信措施與裁減海軍力量有助太平洋區域的穩定；同時，在亞太地區創造一個「無核區」是亞太各國與蘇聯的願望。^⑦一九八六年七月底，戈巴契夫在海參崴（Vladivostok）發表了一篇演講，其中部份內容補充了四月份的「政府聲明」。他針對亞太地區的新形勢及蘇聯在亞太的戰略目標與利益，提出了若干要點與建議。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六日，他在蘇聯西伯利亞克拉斯諾雅斯克邊區（Krasnoyarsk Krai）復提出「七點亞太和平計畫」。從以上事實看，蘇聯過去卅多年中並未放棄建立「集體安全體系」的願望。相反地，隨著國際情勢變化，蘇聯對亞洲的興趣愈見增大，作法也愈益積極。從上述事實，不難看出蘇聯對此地區的一貫目標，及不難理解蘇聯所謂的「下一個世紀是亞洲的世紀」之含義。

戈巴契夫的國際政治理論與亞太政策

戈巴契夫在上臺後，對整個世局重新作了審度與評估，對蘇聯的外交政策、機構與人事也自然作了調整與更換。他所提出的「新政治思維」成了蘇聯外交戰略的指導與運用原則。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廿五日的「廿七大」上，戈巴契夫報告說：「我們的理想是一個無核無暴力的世界，是每個人都能自由選擇他自己發展路線與生活方式的世界。」因此，蘇聯現行外交係以「反對核子危險與軍備競賽，以維護及加強世界和平」為主要方針。^⑧他認為，儘管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這兩個制度有矛盾存在，但是分屬這兩種制度的國家却可以進行和平的競爭與合作，新思維並不意謂著要把每一個人與制度都轉變到馬克思主義的陣營裏，所以「

註④ 同註③。

註⑤ 同註③。

註⑥ 同註③。

註⑦ 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四月廿四日，頁一及頁四。

註⑧ 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二月廿六日，頁二一〇。

政治對話」在今後的國際關係中將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誠實與公開性也將是對話的態度與原則。^⑩ 戈巴契夫深刻瞭解，蘇聯國內的經濟與政治改革，迫切的需要一個和平而穩定的國際環境。在任何對外政策的報告或談話中，他一再地重覆他的觀念：「新政治思維」。新思維的要點包括：生存的相互依賴性，對等安全，減少依賴軍事手段，理性的妥協；透過對話，從軍事、政治、經濟、人權等方面來解決國際間的矛盾等。戈巴契夫把新思維視為推動和平的力量與方式；從而在資本主義世界、社會主義世界與第三世界之間維持利益的平衡。

蘇聯科學院院士普瑞馬可夫（Ye. Primakov）曾在一九八七年七月以「外交政策新哲學」來解釋「新政治思維」，支持戈巴契夫的理論。他首先提到，今天世界上互動關係的增加不僅是表現在生存的問題上，也表現在世界經濟的存在與發展上。他認為，現代人類的共同利益包括環境保護、克服第三世界的落後、戰勝疾病、發現新能源、和平使用太空與海洋以促進人類的進步等。他並指出，世界上的社會革新是人類客觀的需要，但應由各國內部的矛盾所推動；排除革命輸出為核子時代之所需要。因此，國家與國家間的關係不應當是世界資本主義與世界社會主義對抗的場所。他也認為，世人應對「新外交哲學」所包含之安全問題等新概念架構予以瞭解：一、在確保國家安全上，應以政治手段為主。二、若干改變應包括軍事層面；軍事在目前的情況下，在確保對立雙方的安全上仍具有其重要性。三、一國的安全不能犧牲他國的安全而獲確保。四、在美與蘇及華約與北約之間，不應使對抗面擴大。^⑪

事實上，蘇聯今後將以新思維為基礎來改造其對外政策，因為蘇聯認為新思維已反映出當前世界所面臨的事實——就是人類的生存問題。這項問題包括了彼此的共存與合作，以及使用政治手段解決彼此的爭議。蘇聯依據新思維已發展出下列構想或倡議：在西元二千年前逐步消除核武器，廣泛安全，自由選擇，利益平衡，「全歐之家」，亞太整體關係，防衛自足理論，國際經濟關係，裁減武器以建立國家與地區性安全，自他國迅速撤軍，及採取互信措施等。不可否認的，目前蘇聯外交作風最顯著的就是「對話」。這是因為蘇聯把「對話」當作一種回饋，一個能夠知彼知己的機會。^⑫ 在一九八八年的六月廿八日，戈巴契夫在「黨代會」的報告中，特別提出了「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構想，而「裁軍、對話、合作、和平」則是邁向「民主化」的主要步驟。^⑬ 戈巴契夫已認為亞太地區的重要性不斷地在增加，同時在這裏存在著不少糾纏而複雜的「結」。這些「結」就是該地區矛盾

註⑩ M. S. Gorbachev,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7), pp. 139-160.

註⑪ 真理報，一九八七年七月十日，頁四。

註⑫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五月廿七日，頁一～三。

註⑬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六月廿九日，頁三～四。

與不安的因素。他認為應儘早解開這些「結」。此地區內存在著大量的核武器與核子潛力，用核武來維持和平與解決危機絕非可行的辦法；相反地，是一個集體毀滅的途徑。因此，他主張以次區域性的對話、妥協與合作來促成和平與進步。所以蘇聯可能在這地區扮演一個建設性與理性的角色來加速新局面的形成。

一九八五年五月下旬，當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 (Rajiv Gandhi) 訪問蘇聯時，戈巴契夫提出召開「全亞論壇」(All Asian Forum) 的倡議，即以赫爾辛基模式來舉行「亞洲安全與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Asia)。^⑬翌年，蘇聯政府的四月份聲明也建議，以雙邊或多邊的協商來解決爭論性的問題，增進彼此的瞭解與信心，並為「全亞論壇」創造先決條件，共同努力以尋求建設性的解決之道。^⑭當年七月，戈巴契夫在海參崴提出多項倡議：一、蘇聯是亞太國家之一，盼望與亞洲各國一起建立新而公平的相互關係。二、不論亞太各國是屬何種政治制度、社會結構與經濟型態，蘇聯希望與這些國家加強雙邊關係。三、與中共改善關係，並自外蒙古與阿富汗逐步撤出蘇軍。四、改善與日本關係。五、承認美國為太平洋區之大國。六、蘇聯遠東軍力之存在僅為了防衛本國及其盟邦。七、在日本廣島召開以赫爾辛基模式為基礎的太平洋會議 (Pacific Conference)，所有太平洋區的國家皆能參加，以解決亞太地區的問題。這篇談話也包含了防止核武擴散與建造、減少超強海軍在太平洋上的活動、積極裁減核武力與傳統武力、建立互信措施等建議。^⑮十一月下旬，戈巴契夫訪問印度，推動對亞洲的外交政策時，與甘地總理簽署了「德里宣言」(Delhi Declaration)，其中提出建立一個無核無暴力世界的十項原則，這份宣言強調了人類生命與生存的優先性與個人和諧發展條件，並運用人類的物質與知識潛力來解決全球性問題；同時，以互諒互信的態度來達成消除核子恐懼與裁軍措施。^⑯

一九八七年七月下旬，戈巴契夫在接受印尼自由報 (Merdeka) 主編狄亞 (B. M. Diah) 訪問時表示，蘇聯願以嚴肅而負責的態度來考慮亞洲的願望，準備同意消除蘇聯部署在其亞洲地區的中程飛彈，另外對較短程飛彈也將銷毀。同時，蘇聯準備不增加其在亞洲地區的核武航空載具，減少它在太平洋上的海軍活動、支持聯合國「印度洋和平區」的宣言，以及努力追求核禁試並堅持尋求全面性協議。^⑰

一九八八年九月，戈巴契夫到達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不但提出七點亞太和平計畫，也更具體地說明了蘇聯與亞太各國今後的關係與發展，其要點包括：一、蘇聯不加強它在亞太地區的核武力量，並呼籲美國與其他核子強權凍結在此區域的勢力。二、邀

註⑬ 真理報，一九八五年五月廿二日，頁二。

註⑭ 同註⑬。

註⑮ 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九日，頁一—三。

註⑯ 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廿八日，頁一。

註⑰ 真理報，一九八七年七月廿三日，頁一。

請此一地區的主要海軍強權對不增加海軍力量舉行對話。三、提議舉行多邊對話，以減少中國大陸、日本、南北韓、蘇聯在該地區發生衝突。四、美國如果放棄在菲律賓的海空軍基地，蘇聯也將相應地停止使用越南金蘭灣的基地。五、以現有的英、美、日、蘇各國之間的協定為基礎，防止亞太地區海上及空中的意外事件。六、在一九九〇年召開一項國際會議，使印度洋成爲一個無核和平區。七、成立一個「談判機構」以討論亞太地區的安全問題。當然，在這次演講中也有若干實際的建議，如：把引起爭議的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反飛彈雷達站改爲國際太空研究中心，呼籲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全面正常化，在蘇聯遠東地區設立一個「特別貿易區」等。¹⁸

這些計畫、建議與作法積極而主動，務實而又富彈性，顯示出戈巴契夫對外交戰略原則的導向與執行方式。因此，部份亞太國家的反應不但顯得樂觀，而且正期待著實際的參與；西方各國並未立即批判，反而以審慎的研析來作評估。正如戈巴契夫在西班牙利亞告訴其人民的，「他的理論架構已經完成，現在是付諸實施的時候了。」¹⁹對蘇聯以外的各國而言，現在也正是讓戈巴契夫實踐他自己理論的時候了。

戈巴契夫對亞太各次區域國家的政策

戈巴契夫的海參崴演說，固然是重新評估了蘇聯遠東對蘇聯內部經改的意義與角色，但也可看到亞太地區在未來廿一世紀所顯示的重要性，特別是該區域的政治、軍事與經濟三方面的變化，都會對蘇聯有直接的影響與衝擊。由於蘇聯在以往忽略了此一地區的經濟價值與潛力，以及目前亞太國家在世界經濟上所展現的實力與趨勢，自然要讓蘇聯認爲「廿一世紀是太平洋世紀」。²⁰除了經濟因素外，亞太地區的政治形勢並非一致：有屬社會主義國家者，亦有屬東方方式民主國家者，還有屬不結盟集團者。儘管政治信念不同，但大多與美國有外交關係。另外在軍事戰略方面，有的極富資源，有的地處要衝，有的屬於核子俱樂部，有的又極富發展核武潛力，亦多與美國有軍事合作與聯盟關係。凡此種種，皆有形或無形地令蘇聯覺得不安，而欲能有所突破。以下就戈巴契夫對亞太各次區域國家的政策，試作分析。

一、美國

戈巴契夫已認定美國是太平洋區最重要的大國之一。長久以來，美國在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政治、經濟與軍事三方面均作了

註¹⁸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八日，頁一—三。

註¹⁹ 中國時報，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頁十一。

註²⁰ B. Klyuchnikov, "The Soviet Far East in the 'Pacific Century'", *Far Eastern Affairs*, No. 4, 1988, p. 7.

極大的投資。因此，該區域之各國與美國也都有深遠的關係，也深受美國政策的影響。

越戰結束之後，美國的國力與國際聲望曾一度在走下坡。雷根入主白宮後，雖然扳回了他就職前的頹勢，但因其國內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使亞洲各國與美國的貿易磨擦已擴及到以往穩固的政、軍關係上。雖然美國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其欲達目的而罔顧他國利益的心態與作法實令亞洲各國難以諒解，也使若干國家認為美國已忽視或漠視了彼此的「友好關係」。

同時，美國在太平洋區的軍事部署與核武儲存，使得蘇聯急欲取得戰略平衡，以維護其安全與利益。

因此，在蘇、美雙方均已認識世局之重心已轉移到亞洲的情況下，雙方副外長級官員曾就亞洲問題先舉行第一次高階層會談，目的在於避免地區性危機所導致的直接衝突，並增進對彼此立場的了解。事實上，由於雙方均不敢忽略對方在亞太地區所扮演的角色，所以蘇聯希望在和平競爭的原則下，和美國在談判桌上就亞太各國的政局發展及美國在此地區的政、軍關係與影響展開對話。蘇聯並主動指出，亞太的問題是美國長久在此擴張利益所造成的，所以蘇聯希望亞太各國都能在太平洋會議上共同參加、討論及解決這些複雜的問題。

蘇聯對於美國軍事在太平洋上的部署感受深刻。因此，蘇聯曾積極擴增其在印度、太平兩洋的軍力，這雖使得若干亞洲國家擔憂與不安，蘇聯顯然欲以軍事力量為前導來突破美國的「圍堵」，動搖美國長久獨霸亞太的形勢。儘管蘇、美兩國交相指責對方在此區域擴軍，企圖以核武力與傳統武力的優勢來威脅亞太國家，但蘇聯希望美國主動地撤除在此區域內的軍事基地與核武部署。蘇聯呼籲亞太各國在這方面能體認核武的危險而迫使美國撤離，使亞太區域能夠擺脫核毀滅的陰影而建立共存共榮的良好環境。

另外，蘇聯對美國與亞太各國的貿易成果及摩擦極為重視。蘇聯希望增加與美國及亞太各國的貿易，以便對自己的經濟改革與地區開發產生刺激的正面效果。同時，蘇聯也渴望借重美國與亞太各國的科技成果與潛力為蘇聯的經濟建設改頭換面。蘇聯認為美國與亞太各國可以協助蘇聯為其政治改革奠定基礎。因此，蘇聯準備開放門戶吸引外資與科技，並能對亞太地區的經濟環境有所貢獻，進而消除該地區人民對蘇聯之疑慮。

目前，蘇聯無法取代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優勢，但願意與美國對話與採取共同行動，以解決亞太地區不安與進行經貿合作，促成亞太形勢的正常化與國際關係的健康化。

二、亞洲大陸

蘇聯與中共的關係自一九七九年起已有轉機。先有黃華邀蘇大使商談，並提議雙方舉行外長級以上之會談；繼有王幼平訪蘇，改變中共對蘇態度。雙方副外長級談判，雖因蘇聯進兵阿富汗而停止，但在蘇聯領袖布里茲涅夫的塔什干演講後，促成中蘇共恢復「磋商」。接著，安德洛波夫繼任蘇共總書記後也表示，希望雙方關係正常化及逐步擴大雙邊接觸與關係，歡迎雙方繼續的

政治磋商。

一九八四年底，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I. V. Arkhipov）與中共簽署多項重要協定。翌年，雙方外長在紐約會晤。在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五年間，蘇共三名領袖相繼死於任內，雙方藉機展開「葬禮外交」，有助雙方關係的改善。李鵬在升任中共總理前，曾以副總理身分與戈巴契夫二次會晤，其意義頗不尋常。

戈巴契夫在「廿七大」的報告及海參崴的演講中，明白表示願同中共在任何時候、任何級別上討論任何問題。

蘇聯與中共之間的問題主要在於蘇聯進兵阿富汗、越南出兵高棉與蘇聯重兵駐紮外蒙古及沿中蘇邊界地區上。中共認為只要這「三大障礙」存在一天，雙方關係即難有改善之日。因此，蘇聯已做出不少讓步，例如：一、已決定在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五日之前，撤出所有在阿富汗的軍隊；二、分兩階段撤出在外蒙古的駐軍；三、敦促越南儘早從高棉撤軍。當越南宣布在一九九〇年前分三階段完全撤軍之後，中共即宣布雙方外長互訪與舉行高峰會議的決定。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一日，中共外長錢其琛赴蘇，就高棉問題與未來雙方領袖高峰會談進行討論與安排。

由於中共反對「戰略防衛倡議」（SDI），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並在拉羅湯加（Rarotonga）條約議定書上簽字，使蘇聯認為雙方對武器管制的看法一致。中共正實施「經改」並設立「經濟特區」，蘇聯對此甚感興趣，一方面注意中共「經改」的得失，另一方面學習中共經驗，計畫在遠東地區設立「特別貿易區」，歡迎外人投資。

戈巴契夫欲與中共改善關係，其基本動機有三：一、化解相互敵意，確保中蘇邊境平靜；二、共同防止「資本主義」勢力繼續擴張；三、可增進雙方經貿合作。蘇聯的政策與行動已獲得中共初步的回響。

蘇聯與外蒙古在一九七〇年代簽訂重要條約後，雙方黨、政、軍的關係極為密切，在經貿方面亦然，外蒙已成爲「經互會」會員國。當蘇聯與中共之關係曾處於緊張時，外蒙自然成爲蘇聯部署重兵防止及嚇阻中共的基地與前哨。爾今，中蘇共關係出現緩和，外蒙也希望蘇聯從外蒙撤軍。

外蒙古一向支持蘇聯之對外政策與作爲，其所提出之裁軍建議、要求建立無核區、支持不結盟運動等言論皆爲蘇聯之翻版。今後，蘇聯對於外蒙古仍將繼續在黨、政、軍、科技、文化上採取密切合作的政策，並且擴大雙邊投資與貿易。

三、東北亞

對蘇聯而言，日本是個極重要的戰略地區：一是因爲日本處於蘇聯的東方，並控制著若干重要的海峽；二是在日本境內有許多美軍基地、設施與駐軍，而這些基地可能貯藏有核武裝置。近年來，美國一再要求日本增列國防預算，以分擔美國在太平洋上的防衛負擔，也使得蘇聯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感到不安。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蘇聯對日本北方四小島：擇捉、國後、齒舞、色丹的長期占領，使得雙方關係一直難以改善，和平條約遲遲未簽訂。赫魯雪夫曾提議以歸還其中二個小島作為雙方簽訂和平條約與各種經濟合作的交換條件，但却遭到日本的冷漠與敵視。^②一九八五年三月，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雖曾與戈巴契夫會晤，但因日本對北方四島的堅持及蘇聯認為「外國勢力」存在於日本，使得蘇聯難以做到更進一步的放善。

事實上，從一九八一年起，雙方恢復每年一次的外長級會商，但是進行並不順利。一九八六年蘇聯外長謝瓦納澤訪日，次年日本外相安倍晉太郎回訪。蘇聯力圖與日本修好，主要的是考慮到日本的科技與資金的實用性，另一方面日本也有意繼美國之後與蘇聯改善關係。其後，雖有「東芝事件」與「逐外交官事件」，但在日本外相宇野宗佑視察北方領土後仍表示兩國之間有必要擴大對話。一九八八年五月，前首相中曾根再次訪蘇，與戈氏會談，以試探彼此誠意及互表心願。當時，戈氏以要求所有外國軍隊必須撤出日本作為歸還齒舞、色丹二島的交換條件。一九八八年七月廿日由蘇聯「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與日本半官方的「綜合研究開發機構」共同主辦的討論會中，蘇方曾提出將日本北方領土按柏林模式由日蘇兩國「共同統治（佔有、管理）」及予以「特別國際承認」的方式，作為謀求解決領土問題的新構想建議。^③同時，戈氏又表示訪日之願望，使得日本充滿領土問題可能解決之希望。

二次大戰前，日、蘇雙方即有沿海貿易，戰後一度中斷，一九六三年兩國正式簽署協定，重新開始貿易活動。目前蘇聯西伯利亞約有三百餘家企業生產對日出口之產品，而日方亦有一百卅多家商社與組織在俄屬遠東進行地方性貿易。近年來，蘇聯為擴大對日貿易，又提供一些新產品。另一方面，日、蘇合作開發天然資源之後，日本可獲得蘇聯之能源燃料。^④

蘇聯對當前駐日美軍之核武力量、日本經濟的實力、日本的科技發展極為重視，尤其後二項可在開發西伯利亞與俄屬遠東地區上扮演重要角色。今後，蘇聯仍會以北方四島與日本進行對話。美軍一日不撤，蘇聯便一日感到不安，因此蘇聯希望日本能主動要求美軍撤離，日本是否願意如此做可直接影響對話。至於日本，雖然不會放棄對蘇貿易與投資，但對其資金與科技在蘇聯之投入與轉移仍得視蘇聯歸還四島之決心而作考慮。

蘇聯認為朝鮮半島局面為東北亞形勢緊張之主因。韓戰以後，美、韓關係密不可分。由於北韓南侵意圖不曾消失，衝突乃至

註③ Robert A. Scalapino, "Soviet Influence i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in The Coming Decade: Part 1", *Adelphi Paper*, 217, Spring 1987, p. 39.

註④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頁三。

註⑤ 徐景學主編，蘇聯東部地區開發的回顧與展望，長春市，東北師範大學，一九八七年，頁三三七—三五二。

戰爭之可能性便難以排除。然而北韓、中共、乃至蘇聯則認為，美軍駐韓是東北亞地區性問題與不安的根源。

近年來，韓國經濟因成長極快而表現出相當活力，大型企業在執政者之保護支持之下，已將觸角伸及全球，從而提高其國際地位。南韓經濟上的成就，一方面激發了內部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在對外關係上也急謀與蘇聯、中共達到外交上之突破與經貿、體育、文化之交流，並圖以這方式的成就對北韓施壓，以達成統一的目的。

蘇聯對韓政策大概有四個主要方向：(一)建議朝鮮半島的美軍逐漸裁減以降低威脅與危機；(二)仍支持北韓，並提供相當軍援；並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三)與南韓保持「政經分離」之原則；(四)贊同南北韓對話，並希望朝鮮半島朝「非核區」發展。²⁰

四、中南半島

蘇聯對北越一九七五年南進成功協助甚大，所以蘇、越雙方關係自然密切。一九七八年，越南成爲「經互會」成員國，並與蘇聯簽訂友好合作條約。該年年底；越南揮軍進入高棉，使原先與中共之緊張關係更加惡化。蘇聯勢力在翌年當中共在達成「教訓」越南而撤軍後即進入越南，除使用美軍留下之峴港(Da Nang)基地外，也擴充了金蘭灣(Cam Ranh Bay)海空軍基地。爾後，蘇聯太平洋艦隊的艦艇經常亦駐泊於此。由於蘇聯投下大量人力、財力與物力，使該基地之戰略價值提高甚多：(一)阻止中共對越發動軍事行動之可能性；(二)蒐集中共與美國之軍事情報；(三)延伸蘇聯軍力至東南亞海運交通線，並在必要時掌握印度洋與波斯灣區域之軍事優勢；(四)增加蘇聯在此一地區之政治影響力；(五)可在美國停止續租在非基地協定後迅速填補戰略真空；(六)與海參崴基地連成一條包圍亞洲大陸與嚇阻軍事行動之攻防陣線。

蘇聯依據雙方盟約而承擔對越之經濟援助與政治支持。蘇聯大多以長期低利貸款方式提供越南每年約十一億美元之援助，然而越南因將援助之部份用於填補各項虧損而令蘇聯不滿。爲抵償貸款，越南仍須輸出原料、農產品及勞工。爾今，越南因經濟倒退及日本停止貸款，鑑於中共已採取經濟改革，蘇聯也正推行改革，越南乃決定跟進，試圖從貧窮落後中掙脫出來。

一九八六年，越共總書記長征(Truong Chinh)應邀訪蘇時，除表示支持戈氏的海參崴倡議外，二人希望同中共關係正常化，以促使亞太局勢的健康化；因此他們呼籲該區域所有國家透過會議處理爭執問題。十二月間，越共召開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年輕的阮文靈(Nguyen Van Linh)在長征、范文同(Pham Van Dong)、黎德壽(Le Duc Tho)聯袂辭職後出任總書記，接著便宣布政府改組，變更人事，裁併及新設部會，同時，亦效法蘇聯要在大選時採取「差額選舉」的辦法。

一九八八年，蘇聯有意在高棉問題上讓步，以換取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及消除東協(ASEAN)的疑慮，並在國際輿論上取

註② V. Denisov and V. Moiseyev, "Asian Pacific Region and Korean Settlement", *Far Eastern Affairs*, No. 1, 1988, pp.47-57.

得先機。因此，蘇聯希望越南儘速自高棉撤軍，一來可去除蘇聯外交政策上的障礙；二來可減輕蘇聯軍費的負擔；三來可緩和亞太形勢，並提高戈巴契夫的個人聲望。越南雖然希望拖延撤軍以求得更多蘇聯軍經援助並牽制中共，但最後不得不屈服於蘇聯的壓力。

五、東 協

戈巴契夫在他海參崴的演說中已提到要與東協國家擴展關係。蘇聯認為東協與中南半島國家的爭執是因西方帝國主義之介入所引起的，因此東協與中南半島國家建立關係的障礙並非不能克服，只要以友善與互不干涉為原則，在為了亞洲整體安全的顧慮下，雙邊應能及時地解決問題。^⑤

東協成立已廿一年了，自始蘇聯即認為它是美國全面性與區域性圍堵政策中重要的一環。但近年來，由於美國並未出面促成高棉和談並使越軍撤出高棉，美國出售武器給中共，以及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高漲，因此在東協與美國的關係上出現了低潮。東協六國，除新加坡之外，均有天然資源，但六國皆富經濟發展潛力。蘇聯針對問題與特性，表示願意為這些國家提供市場，並要求增加對蘇的貿易與投資。

蘇聯視印尼為東協主要國家，一來由於印尼資源豐富，又是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員國；二來印尼在不結盟運動（NAM）中擔任要角。因此蘇聯外長在一九八七年的東南亞之行，先到雅加達，一方面聽聽印尼對越棉衝突的關切之聲，另一方面也就經濟與裁軍兩項主題來引起印尼的興趣。同年七月，戈巴契夫在接受印尼自由報主編訪問時也表示「東協在解決高棉問題上也能作出重大貢獻，蘇聯特別歡迎印尼與其他東協國家的倡議。」^⑥

蘇聯對菲律賓的情勢極感興趣與關切。自艾奎諾夫人（C. C. Aquino）取代馬可仕後，美國對於新政府既予軍經援助，又予政治壓力。政治的壓力是牽制與避免柯拉蓉對於左派的縱容及對共黨國家的親近，軍經援助則為了穩定菲國的經濟與內部因非共所製造的不安。一九八八年，菲、美雙方曾為非境美軍基地續租協定而意見不合，經半年折衝，在十月中旬始達成協議，簽訂新約。在此之前，蘇聯駐菲大使、副外長，乃至戈巴契夫本人都曾提出了蘇、美互撤其在越、菲之基地的建議。這些建議在菲國內部引起了不同的反應，而非國的國會議員對蘇聯的提議則表示審慎的考慮與歡迎，他們亦認為需在下一世紀消除亞洲的核武器

註⑤ E. Grebenshchikov, "Asian and Problems of Pacific Cooperation: Foreign Solutions and Search for Own Approach", *Far Eastern Affairs*, No. 2, 1987, pp. 33-42.

註⑥ 同註⑤。

，使亞洲成爲「非核區」。

蘇聯對於東協的政情提供建議之外，對經濟亦訂出了計畫與採取了行動。在計畫方面，如：爲菲律賓興建發電廠、海產加工廠與轉移修船技術；收購泰國的稻米與代爲發射通訊衛星；爲馬來西亞提供核子、環境、能源與太空人訓練計畫；讓新加坡企業承擔全面改建蘇聯遠東地區納霍德卡（Nakhodka）港的造船廠、提供運輸及電算機的合營企業、興建現代化的觀光旅館等，這一切的合作與交流計畫，將在先解決高棉問題後即予擴大或實施。

在行動方面，蘇聯爲了增加實質上的經濟利益與影響力，除了想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WB）之外，對於參與亞太地區的經濟組織也在積極展開。一九八六年四月，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賈丕才（M. Kapitsa）在曼谷出席「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ESCAP）的會議」；十一月，蘇聯首次派代表以觀察員身份出席在溫哥華舉行的太平洋經合會議（PECC），蘇聯希望加入該組織，成爲會員國。一九八八年五月，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及國際關係研究所（IWEIR）所長普瑞馬可夫率團再度以貴賓身份出席在大阪的年會，並表示蘇聯想透過太平洋各國展開廣泛的經濟關係，以發展蘇聯遠東地區。另外，一九八七年四月在大阪及一九八八年四月在馬尼拉的亞洲開發銀行（ADB）的年會，蘇聯均派觀察員與會，一九八八年三月廿五日，蘇聯更宣布成立半官方性質的蘇聯國家亞太經合委員會（SNCAPPEC），作爲謀求與亞洲國家擴大經貿關係的表示。

綜上所述，蘇聯在東協：（一）尋求建立經濟關係；（二）鼓勵各國加速與蘇聯合作開發其經濟；（三）勸服越南儘快撤軍以消除各國對蘇、越擴張的疑慮；（四）減低美國在此地區的實力與影響力。

五、南太平洋

戈巴契夫對於位處南太平洋的澳、紐及十三個新興獨立島國並未忽略。這個地區的情勢大概如下：第一，美國通往西太平洋主要貿易國的航線及美國飛彈試射場瓜加林島（Kwajalein Is.），均在南太平洋區域。第二，一九八六年，因爲紐西蘭政府不讓美國核子動力船艦靠泊該國港口及雙方外長在會談時均不作讓步，導致兩國不再進行軍事合作、聯合軍事演習與情報交換，並使得美澳紐公約（ANZUS）解體。第三，美國捕鯨船不肯支付南太平洋島國政府的捕魚費及不肯承認這些島國擁有二百哩專屬經濟區，以致與這些島國的關係陷於緊張。第四，西方核子國家堅持繼續在南太平洋上進行核試爆及傾倒核廢料，造成與南大論壇（South Pacific Forum）十三個的關係惡化。

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南大論壇諸國利用美國原子彈轟炸廣島四十週年的日子在拉羅湯加通過了根據澳大利亞的倡議所擬訂的「南太平洋非核區條約」，蘇聯已在該條約的附屬協定書上簽署，這使得戈巴契夫支持南太平洋無核區（SPNFZ）運動的呼

籲，獲得了此區域政府與人民的好感。

除了反核，蘇聯也提議以漁產加工、改善機場與港口設施來協助西薩摩亞（W. Samoa）、東加（Tonga）、斐濟（Fiji）、吉里巴提（Kiribati）、萬納杜（Vanuatu）等國，但要求這些國家能提供漁業基地或准其漁船靠港。其中吉里巴提與蘇聯曾於一九八五年五月在新加坡談判漁業協定，儘管美、澳兩國在事前基於蘇聯漁船是否在今後從事軍事任務的考慮曾予警告及反對，但均未為吉國所接受，因為吉國每年可從蘇聯獲得一百七十萬美元的捕魚權利金。另外，斐濟也與蘇聯簽了漁業協定。至一九八六年六月底為止，包括萬納杜在內，已有八個島國與蘇聯建立了外交關係。

蘇聯以商業利益與經濟援助之捕魚外交，成功地激起了南太平洋島國的興趣，同時對此地區正在形成的不結盟運動亦表歡迎與支持，這都實踐了戈巴契夫所謂的「蘇聯要與澳、紐兩國以及本區域內政治方面新興獨立的國家改善關係。」^②

結 論

自戈巴契夫接掌政權後，蘇聯不但採取了新的全球性外交戰略，而且其亞太政策亦出現了新面貌。以往的強硬外交路線，已被務實、彈性路線所取代。儘管美國在此地區奠定了以聯盟、安保為方式的集團型態之基礎，但是蘇聯却以讓步、對話、合作、互利的方**式**，在亞太地區打開了新局。最明顯的便是戈巴契夫的海參崴演講。在講辭中，他表示願意尊重亞太各國的傳統、成就、生活方式、信念、價值觀，乃至偏見，重視這裏的多元化特性，而且還要學習去認識與瞭解。另外再加上對各次區域國家的關係，或極力爭取，或進行加強，不但凸顯了美國的好戰與自私，而且還造成了亞太政府與人民的心動或好感。又儘管美國及若干國家一直呼籲要小心戈氏的「笑臉外交」，但是戈氏以行動來表達他要「緩和亞洲地區情勢」的方式，和以主動出擊來證明他**想**「致力和平」的策略，使得蘇聯在亞太的敵人與朋友，都已處於被動與等待的狀態。

也許蘇聯在亞太地區的主要對象是美國、日本與中共，但是蘇聯對於能夠影響這三國的其他亞太國家，並未放鬆製造和諧的政治氣氛與有利的經濟環境。事實上，有原則的彈性運用與積極參與已成為一九八六年以後蘇聯亞太政策的證明印記。

總而言之，戈巴契夫的亞太政策，是希望在西元二千年前，減少與美國的直接對抗，把較多的軍事支出與時間騰出來，發展經濟、改革政治與保持戰略均勢，同時也建立起「反對亞太地區集團化與軍事化」的愛好和平的新形象。基於他「對話勝於對峙」的構想，今後他的外交表現方式會更加複雜多變，而降低美國在本地區的影響力與增加亞太各國對蘇聯的認同感之用心、計畫與步伐也會更深刻、周延及加速。